

## 從外國字到國語字 一 民族主義、現代化與越南羅馬字政策\*

張學謙

台東大學華語文學系教授

### 摘要

越南曾經是多文字使用的社會，除了漢字和喃字外還有羅馬字。在法國殖民越南期間，越南進行文字改革，嘗試以羅馬字取代漢字。本文探討這段時期越南羅馬字如何從功能有限，不被認同的外國字，轉換為代表國家認同象徵的國語字。文字改革牽涉複雜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因素。本文運用語言政策理論探討法國殖民時期羅馬字在多文字戰爭中勝出的原因。本文強調語言意識形態及語言管理對越南文字規畫的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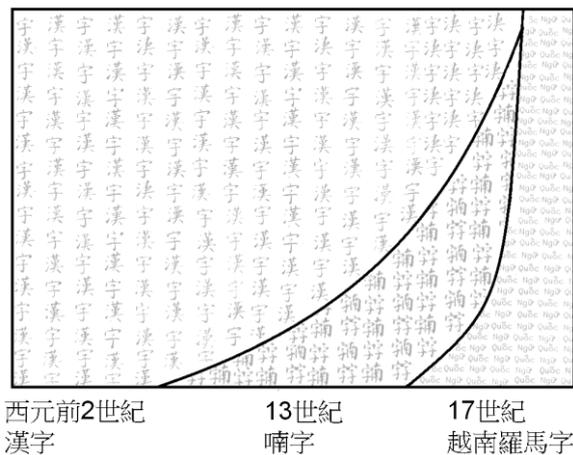
**關鍵詞：**漢字、喃字、語言政策、國語字、羅馬字、文字改革、越南

---

\* 本文語言政策的理論架構取自進行中的國科會補助計畫《家庭語言政策與語言保存》(NSC 101-2410-H-143-009-MY2)，感謝國科會的經費贊助。

## 壹、前言

Lo Bianco (2001: 170) 指出：「越南是受到中國語言影響，但是成功的執行以羅馬字取代漢字的唯一國家。」越南的羅馬字稱為 Quốc ngữ，字面上的意義是「國語」(national language) 的意思，不過，卻被用來指書寫越南語的羅馬字<sup>1</sup>。在古時候，喃字 (Chữ Nôm) 也曾被稱為 Quốc ngữ，意義近似民族文字，與外來的漢字做區隔。越南曾是漢字文化圈的一員。漢字是越南最早使用的文字，約西元前 2 世紀左右傳入，使用漢字有兩千多年。喃字創於 13 世紀，是漢字式的民族文字。Quốc ngữ 是越南羅馬字，始於 17 世紀。圖 1 為越南文字變遷示意圖。



來源：參考 DeFrancis (19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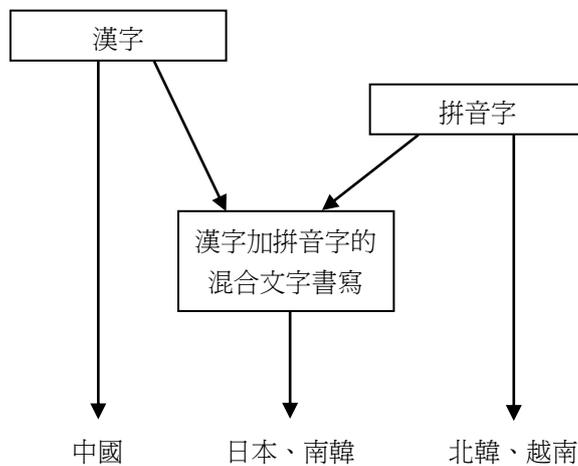
圖 1：越南文字變遷示意圖

越南因為先後被不同的國家殖民，形成多語言、多文字的現象 (DeFrancis, 1977)。到了法國殖民時期 (1861-1945)，已經有三種語言：越南語、華語和法語；四種文字：漢越字 (Sino-Vietnamese)、字喃、Quốc ngữ 及法文。Le 與 O'Harrow (2007: 427) 指出，在法國殖民時期，最主要

<sup>1</sup> 本文根據文意脈絡將 Quốc ngữ 譯為「國語字」或「越南羅馬字」。

的「語言和認同衝突是文字選擇和使用的議題，而非口語」，因為越南語原本就是越南全國通用的主體語言。在這場文字戰爭最後取得勝利的不是歷史最悠久的漢字，也不是最具民族色彩的喃字，而是過去曾被稱為 *tay cuoc ngu* 「西國文字」的越南羅馬字，*Quốc ngữ*<sup>2</sup>。事實上，*Quốc ngữ* 到了殖民後期，已經在文字戰爭中獲勝，在越南實際獨立之前，國語及其書面語早已確定 (Le & O’Harrow, 2007)。

越南羅馬字取代漢字，成為越南的官方文字。這在漢字文化圈是相當少見的例子。漢字文化圈通常發展出漢字及拼音字（如諺文、片假名、羅馬字）的雙文字現象 (*digraphia*)，這兩種文字可以組合出三種書面系統，如圖 2 所示 (張學謙, 2008; Tiun, 1998)：完全使用漢字（如中國）、完全使用非漢字的拼音文字（如越南的國語字及北韓的諺文）、或混合兩種文字的書面語（日本及南韓）。在漢字文化圈的國家中，只有越南採取羅馬字政策，並成功的以羅馬字取代漢字。



資料來源：張學謙 (2008)。

圖 2：漢字文化圈的雙文字發展示意圖

<sup>2</sup> DeFrancis (1977: 85-87) 對 *Quốc ngữ* 這個詞的演變做了一番考查。*Tay* 的意思是「西方」，在越南通常指法國，寫成 *Tây Quốc ngữ*，指西國文字、外來文字，可以跟過去指稱喃字為 *Quốc ngữ* 區分，後來省略 *Tây*，簡省為 *Quốc ngữ*，法國政府似乎沒有注意的這個詞的政治意涵，繼續使用 *Quốc ngữ*。

文字改革並非只是語言學技術的問題，而牽涉到複雜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因素。如同 Fishman (1991: 178) 所指出的：

創設一種新文字的結果，往往威脅到現有的利、害與實際、象徵等相對關係，而對舊文字進行改革，則擺明要改變這類關係。

越南文字改革如何成功的將原本被視為外國文字的羅馬字，轉換為代表國家認同象徵的國語字是值得探討的問題。Lo Bianco (2001: 202-203) 認為，語言規劃學科尚未提出能妥善解釋越南羅馬字取代漢字和喃字的原因。他批評語言規劃太過於偏好描述，而非理論建構，在分析上欠缺歷史和政治經濟方面的論述。因此，本文運用 Spolsky (2004) 及 Shohamy (2006) 的語言政策理論探討法國殖民時期羅馬字在多文字戰爭中勝出的原因。Spolsky 的語言政策理論由語言實踐、語言意識形態 (language ideology) 和語言管理 (language management) 組成。本文將集中探討語言意識形態及語言管理在越南羅馬字政策所扮演的角色。

本文結構如下：前言之後，第二節回顧越南的漢字和喃字發展歷史；第三節描述羅馬字從外國字變成國語字的過程；第四節則從語言政策的理論分析越南羅馬字政策；最後，第五節是本文的結論。

## 貳、漢字和喃字的發展簡史

越南是個多文字的國家，如表一所示，越南的語言文字發展可以分成好幾個階段。在 13 世紀前只有漢字，喃字在 13 世紀出現後，17 世紀羅馬字才加入越南的多文字社會。越南曾被中國封建王朝統治長達千餘 (西元前 111 年到西元 939 年)，因此，受到中國政治與文化極為深遠的影響。漢字大約在趙佗的「南越國」時期引進越南。漢字在越南稱為 *chữ Hán* (字儒)，用於高階場合，如行政、教育、科舉、學術和古典文學 (Nguyen, 1999)。越南語則使用於日常生活，缺乏越南話的書面語，造成口語和書面語脫節。

表 1：越南語言發展大事記

時 期	語 言	文 字
原始越南（第 8 至第 9 世紀）	越南語和漢語	漢字
上古越南（第 10 至第 12 世紀）	越南語和漢語	漢字
古越南（第 13 至第 16 世紀）	越南語和漢語	喃字、漢字
中世紀越南（第 17 至第 19 世紀）	越南語和漢語	喃字、漢字、國語字
近代越南（法國殖民統治，1861-1945 年）	越南語、漢語和法語	喃字、國語字、漢字、法文
現代越南（1945 年至今）	越南語	國語字

資料來源：Nguyen Tai Can（1999）。

越南於西元 939 年，趁著唐朝末年大亂，脫離中國直接統治，成立獨立的國家，不過，越南仍然和中國維持藩屬關係（蔣為文，2005）。在越南封建王朝期間，漢文仍然是政府使用的唯一書面語，就算中國不再直接統治越南，漢文仍然享有上層特權地位，一直延續到二十世紀初（Coulmas, 1989）。漢文充當中國的帝國語言，聯繫宗主國和保護國。漢文也是行政語言。中國的等級制度相當依賴書面語，自古以來，科舉考試就是選拔官員的方法，考試的內容就是以漢文寫成的經史典籍（Coulmas, 1989）。蔣為文（2005）指出，漢字文化圈的國家通常不但借用「漢字」還會同時引進「儒家思想」以及「科舉制度」。如果說，「儒家思想」提供漢字學習的整合性動機，那麼「科舉制度」就提供工具性動機。李朝（1010-1225 年）和陳朝（1225-1400 年）時期，漢字繼續充當官方文字，也大力提倡漢文學，當時盛行的宗教，也促進漢字的普及（羅文青，2007）。

自 10 世紀中葉，越南就成立自己的國家，卻依然沿用漢字。越南的民族語言，喃字，一直到 13 世紀才出現。民族文字發展緩慢是漢字文化圈常見的現象，為了維護既得利益，輕忽本土文字，再加上漢字及漢文和政權結合，造成文教權威的保守性格（鄭良偉、張學謙，2001；蔣為文，2005）。

喃字是以漢字為原料，按照漢字的假借、形聲、會意三種造字法創造的漢字型越南話文字。喃字需要依靠漢字的知識，根據漢字的漢越音來識

讀，喃字書寫繁複，音義不明，普及不易（于向東、譚志詞，2005）。喃字還有社會聲望低落的問題。喃字是「南方的字」的意思。Hannas（1997: 87）提到「南方語言地位次等原理」（Principle of Substandard Southern Speech）：愈南方的語言，地位愈低，日本、韓國和越南都是如此。文字的評價也符合他的觀察，喃字的社會評價不高，和漢字比較，屬於低階的文字。喃字主要用於紀錄民間口傳文學、創作文學、翻譯佛經、及漢字註解（Nguyen, 1999；引自蔣為文，2005）。喃字的出現與越南民族自尊意識的逐漸增強有關（羅文青，2007）。喃字在李朝（1010-1225 年）時出現，在黎朝（1418-1787 年）發展，最後盛行於光中時期（1753-92 年）。西山王阮惠主張國家在行政教育、科舉考試和祭祀活動中使用越南語和喃字，並規定每場科試的第三場要求考生用喃字作答（羅文青，2007）。雖然，喃字是越南的民族文字，也曾短暫的得到官方的支持，卻一直無法無法取代漢字或與之平起平坐。蔣為文（2005：195）認為喃字難以推行有語言和社會因素：(1) 語言因素：喃字比漢字更加複雜、難學，加上未標準化；(2) 社會因素：越南官方長期將漢字奉為圭臬，漢字地位崇高；科舉制度將漢字、漢文列為考試科目。19 世紀中期法國殖民越南推廣越南羅馬字，到 20 世紀初，字喃已被羅馬字所取代（于向東、譚志詞，2005）。

### 參、從外國字到國語字的過程

越南羅馬字開始於 17 世紀。越南羅馬字與歐洲人在越南的傳教活動有密切的關係。1615 年基督教開始在越南南部進行傳教活動。因為傳教需要學習越南話，傳教士就以羅馬字創造出書寫越南語的文字系統，1651 年，亞歷山大·德·羅德（Alexandre de Rhodes）在意大利出版《越一葡一拉丁詞典》和《對願入天主教接受洗禮者的八日教程》，這兩部著作是越語羅馬字出版的第一批著作（唐慶華，2009；于向東、譚志詞，2005）。

早在 17 世紀初，越南羅馬字就誕生了，但是一直到 1860 年代羅馬字主要用於天主教出版的宗教書籍（于向東、譚志詞，2005）。越南羅馬字

受到官方禁止西方宗教的影響，無法廣泛的傳播<sup>3</sup>。有趣的是，這時期的文字使用和宗教有所關聯，天主教徒使用羅馬字、佛教徒使用喃字、儒教徒則使用漢字 (DeFrancis, 1977: 149)。這 200 多年越南羅馬字主要用於教會，可以說是「教會羅馬字」，Hannas (1997: 85) 把這段時期形容為越南羅馬字的「孵化期」。一直到法國殖民者的到來，羅馬字才逐漸走出宗教領域，向外傳播。

越南羅馬字的起源和宗教的傳教活動有關，不過後續的發展，則和法國在越南的殖民活動息息相關。1861 年法國人開始準備征服越南，法國於 1858 年與西班牙聯軍進佔峴港，1887 年成立法屬印度支那聯邦，法國正式在越南殖民統治，將越南劃分為三個行政區：交趾支那（南圻）、安南（中圻）與東京（北圻），交趾支那為法國直轄的殖民地，東京與安南則為法國保護地（陳立，2005）。

越南羅馬字在法國殖民時期（1861-1945）被稱為「國語字」。法國在越南的羅馬字政策可以分為兩個時期（DeFrancis, 1977）：(1) 法國殖民者與親法者（collaborationist）進行的國語字推動期（1861-1905），羅馬字推展進度緩慢；(2) 由法國殖民者、親法者與民族主義者進行的國語字推動期（1905-45），羅馬字迅速成長。

## 一、國語字緩慢成長期（1861-1905）

法國的殖民統治理論主要有兩種方法：(1) 「順應的方法」（association）：在法國政府能夠控制的前提下，贊成、鼓勵傳統的越南知識和社會結構，容忍漢字和喃字；(2) 「同化的方法」（assimilation）則主張改造越南社會及其語言，以法語取代越南語為最終目標（DeFrancis, 1977; Le & O'Harrow, 2007）。一般來說，早期的做法比較接近順應的方法，之後，則以同化為主。法國視其在越南的角色為「進行文明教化」（civilizing mission），順應的方法不過是過渡時期的權宜之計，法國在越南推行的語

<sup>3</sup> 廣南王阮福瀾（1635-48 在位）於 1639 年宣佈禁止天主教傳教，並驅除傳教士（范宏貴、劉志強，2008）。

言政策一開始就是同化爲目標 ( DeFrancis, 1977 )。法國政府官員對殖民政策意見不一，不過，一致認爲去除儒家思想、漢字與科舉制度。如此才能讓越南人在文化和意識形態上遠離對中國文化的依附及中國的政治影響，將越南人拉往法國這邊 ( Lo Bianco, 2001 )。法國推動越南羅馬字有兩個主要原因 ( DeFrancis, 1977；引自蔣爲文，2005：197-98 )：

第一，法國殖民者認定漢字是法國人與越南人之間的障礙。由於越南長期奉中國為宗主國、並透過漢字學習中國文化與價值觀。為讓越南斷絕與中國的關係、並改為親近法國，勢必要用羅馬字取代漢字。

第二，羅馬字是讓越南人從越語過渡到法語的重要媒介。法國殖民者認為當越南人掌握著越南羅馬字後就容易進一步學習法語、最後並完全轉換到使用法語。所以推行羅馬字是推行法語的重要手段之一。

需要注意的是，法國的法越雙語教育並非追求語言平等的作為。因為，法國語言政策追求的終極目標是說法語的越南，越南語僅有附屬的地位。法越雙語教育是過渡式的雙語教育，簡單的說，就是透過雙語，追求法語單語同化的目標 ( DeFrancis, 1977: 229-32 )。于向東、譚志詞 ( 2005 ) 也提到法國在越推行國語字教育是爲了消滅越南語，以達成獨尊法語的「語言滅絕」政策。Ramond F. Betts 將法國殖民者在文教領域的同化傾向描述如下 ( 陳立，2005：75 )：

法國殖民者內心深處都具有同化主義傾向。他們一向以偉大的法蘭西文化而自大，認為法國是世界的中心……在殖民地的文化和教育領域，尤其是在殖民地高等教育領域，同化是法國殖民者的根本信條。

爲了達成語言同化的目的，法國殖民政權很快的就鎖定漢字及儒學教育。1862 年第一任交趾支那總督鮑那德曾在信中提出取締漢字的理由：「當這種與進步不相容的漢字還作為唯一的交流思想的時候，只有發展法國—安南學校，用拉丁字母代替漢字，這是促使轉化的最有效的方法」 ( 范宏貴、劉志強，2008：268 )。法國政府視爲眼中釘的是那些活躍於漢文化爲

中心的越南精英及那些以捍衛族群認同、追求獨立的文人（Le & O’Harrow, 2007）。另外，不少儒學教師反法，甚至是反法運動的發起者和領導者，對法國殖民統治構成威脅，因此，儒學及其使用的漢字，都成為法國殖民政府所要剷除的目標（陳立，2005）。國語字的政治功能，受到重視，Vial（DeFrancis, 1977: 151）早在 1889 年就說：國語字「是能讓我們將交趾支那從安南和中國孤立出來的新而重要的工具。」DeFrancis（1977: 77）正確的指出，法國越南語言政策的主軸就是「讓越南遠離中國的影響，將越南人拉向法國殖民者這邊，因此廢除漢字被認為是達成同化的基本步驟」。

在第一階段的羅馬字推廣主要是由法國殖民政權及親法者推行。法國人對官方推行越南羅馬字的看法不一。有些人對教授越南羅馬字有不同的意見。國語字教學弱化法語地位，害怕羅馬字最後變成削弱法語地位（Le & O’Harrow, 2007）。法國政府雖然對 Quốc ngữ 存有戒心，怕羅馬字引發越南民族意識，卻不得不透過羅馬字對付頭號敵人，漢字。另一方面，也想透過羅馬字的學習轉移效果，促進法語推廣。因此，法國政府支持國語字教學、出版和官方認可，同時也儘可能的縮減漢字使用（Hannas, 1997）。

反對國語字的越南人分兩大陣營，彼此不和：通曉漢文的文人階級，看不起國語字及依附法國殖民政權的親法通敵者，則偏好法語（DeFrancis, 1977: 148-49）。在反法者陣營中，東京和安南的文人最為反對，傳統文人看不起羅馬字，不想學羅馬字，也反對國語字作為官方文字。親法的陣營也不一定支持推展越南羅馬字，有些人支持學校不教越南語，改教法語，以便將越南同化為東方的法國，不管是語言或思想都要徹底的法國化。到了 19 世紀晚期，文字成為區別敵我的標記（DeFrancis, 1977: 148）：「喃字寫成的越南文持續作為直接或間接的反抗法國統治的工具，書寫國語字的越南文，逐漸的成為親法通敵者的語言。」在這樣的情況下，文字的使用成為身份認同的標記，國語字的負面評價不利其推廣，對抗法的越南民族主義者，國語字在這個時期是「他者」的文字、是「敵人」的文字。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在這個時期，漢字及喃字仍保有相當的活力，19 世紀後半葉的反法文宣主要是以漢字寫成的漢文，以佃農為對象的文章，則以字喃書寫，念給不識字的聽眾。漢字的階級性仍然存在，熟讀古典漢文的

知識份子，就算堅決的支持越南獨立，仍然看不起字喃書寫的文章，視之為難登大雅之堂的粗俗文字，漢文書寫才是民族認同的語言標記 ( Le & O'Harrow, 2007 )。越南的羅馬字的推展需要處理負面的象徵的問題。

法國殖民政府一方面打擊漢字，一方面推廣國語字。在打擊漢字方面，主要透過瓦解漢字、漢文和漢學的機構和獎賞系統。改朝換代後，法國人統治需要低階的政府官員，原本說漢語的官員由幫助法國人與越南人溝通的通譯取代，這些通法語的通譯，通常是信仰天主教的越南人。法國人很早就以國語字筆錄作為書面資料，訓練通譯，法國人刻意的避開傳統使用漢字的官僚體系，為的是打擊漢文化的影響力 ( Le & O'Harrow, 2007 )。1864 年正式創立國語字為教學媒介的小學，以取代傳統漢學教師 ( Lo Bianco, 2001 )。法國政府建立一些「新學校」，以培養本地的法語通譯，教導阮朝官員法語。在第一階段，法國政府對漢字、儒學採取「順應的方法」，為了避免衝突、安撫人心，保留了安南與東京地區的儒學教育體系，不過儒學失去失去地位和功能，名存實亡，逐漸萎縮 ( 陳立，2005 )。科舉制度這個傳統用來招募信奉儒家的官員，成為學習漢文的獎賞系統。1865 年交趾支那廢除將近一千年的科舉制度 ( Lo Bianco, 2001 )。

在教會學校，本土天主教徒的基礎下，法國政府以國語字重構學校教育和行政體制 ( Lo Bianco, 2001 )。法國殖民政權極力的控制學校教育，透過學校推廣越南羅馬字和法語。1864 法國印度支那總督下令在小學進行羅馬字的越南語教學 ( Le & O'Harrow, 2007 )。越南羅馬字不但在越南各學校教授，1878 年南圻總督還頒佈了兩條規定 ( 范宏貴、劉志強，2008 : 268 )：

1. 從 1882 年 1 月 1 日開始，所有公文、決議、決定、案卷、命令等等都必須使用國語字，此外，所有公開張貼的文書都要使用國語字；
2. 從 1882 年開始，只有懂得國語字的人才能有機會到政府機關任職，才有機會升職。

1896 年印度支那總督在順化成立法越雙語學校，稱為順化國學學校；1898 年印度支那總督決定在南定省的科舉考試增加複試，增考越南羅馬字

和法語，並且規定 1903 年之後，只有初試和複試都達到標準才有機會做官（范宏貴、劉志強，2008）。南部總督於 1882 年規定所有越南語的公文必須用羅馬字（Vien Van Hoc, 1961）。由於原本的漢文官僚體系不配合，法國政府重組了行政結構，結果重創漢文官員及漢文體系，壓縮了漢字使用領域。另一方面，越南羅馬字超出了原本天主教內部的功能，開始進入新的行政和教育體系（Lo Bianco, 2001）。

國語字在出版方面也開始成長。一直到 19 世紀中葉，國語字可以說是教會羅馬字，主要用於宗教事務。法國政府透過推廣越南羅馬字出版品，嘗試削弱漢化官員的知識霸權（Le & O'Harrow, 2007）。1862 年，法國殖民者入侵越南。第一張國語字報紙《嘉定報》1865 年在南圻發行，一直發行到 1897 年；越南羅馬字也從這時起叫做「國語字」（Chữ Quốc ngữ）（蔣為文，2005）。1901 年出版了第一份非官方羅馬字雜誌《農賈茗談》（*Nông cổ mìn đàm*），它也是第一份經濟類的越南羅馬字報紙，1921 年停刊。

在第一階段，法國殖民推行羅馬字是為了打擊漢字及作為學習法語工具，雖然加強了羅馬字的工具性價值，卻造成羅馬字與殖民者連結一起的負面認同，羅馬字是屬於「他者」的外來文字。如何破除「外國文字」的魔咒以及建立國語字的讀寫基礎建設，是下個階段的重點。

## 二、國語字迅速成長期（1905-45）

第一階段的國語字推動主要是法國殖民者及親法者，反對者主要是傳統文人。羅馬字雖然在第一階段獲得法國政府制度性的支持，不過，在意識形態及身份認同上還沒有獲得支持。本節將描述越南羅馬字在第二階段由殖民者的「外國字」轉型為自主的「國語字」的過程。

19 世紀晚期，國語字成長緩慢，直到 20 世紀早期才快速發展。羅馬字在這個階段的反法運動得到民族主義者的認可。一掃過去羅馬字和外國文化侵略的聯想，羅馬字方便大眾教育推廣的功效受到重視（Lo Bianco, 2001: 186）。

第二階段的國語字推廣延續第一階段強化學校教育和行政體制的做法。以下是一些在教育上推廣越南羅馬字的作為，1906 年法國政府成立教

育提升委員會，將越南羅馬字定位中學學科，1908 年新成立的教育部也支持推廣越南羅馬字 (Le & O'Harrow, 2007)。法國殖民政府分別在 1905 年和 1906 年在越南設立了印度支那公共教育署和印度支那本地教育促進委員會掌管殖民地教育。延續之前抑制儒學教育的政策，開始籌劃法越教育系統；1917 年頒佈《印度支那聯邦公共教育法》，正式的確認「法越學校是為越南人接受教育的惟一途徑」(陳立，2005：69)。語言教學是法越教育課程的重點。小學階段要學越南羅馬字以及學習法語，中學生和大學生則只要求學習法語。從這裡可以看出，法國殖民政府主要是採取過渡式雙語教育的方式，維持越南語從屬的地位。

科舉制度的廢除給予漢文教育致命的一擊。1906 年順化王朝下令修改中圻和北圻的學制和科舉制度，除了削減漢文學習時間外，還增加越南羅馬字和法文學習的時間，另外，科舉考試也增加國語字和法文的考試(唐慶華，2009)。學校教育抑制儒學教育已經切斷學習漢文、漢字的管道，廢除科舉制度更失去了學習動機。交趾支那早就廢除科舉考試，東京和安南地區的科舉制度分別在 1915 年、1916 年廢除，雖然中國在 1905 年就廢除科舉制度了。「科舉制度廢除的日子，標記著古典漢文系統的教育正式走入歷史。」(Lo Bianco, 2001: 191)。廢除科舉考試後，法國政府和阮朝完全廢除儒學學習，實施法越教育，法文和國語字成為學習和考試的科目(唐慶華，2009)。法國當局推行羅馬字有不錯的成績，到了 1935 年，根據 Cordier (1935: 121) 的估計，越南的識字人口當中，認識越南羅馬字的人占 70%，認識字喃的有 20%，認識漢字的只有 10%。顯然的，控制學校教育，就控制語言的活力。儒學及其使用的漢字，就此沒落，二十世紀初的詩歌也反映出儒學衰微的狀況，其中有一首詩說：「學儒家的道理只是白費時間，十位老師只有九個學生。」(DeFrancis, 1977: 152)。至此，漢字已經失去過去享有的工具性價值，失去了作為高階語言的地位與聲望，僅存的情感認同價值，也隨著二十世紀初越南政治社會的變遷，也逐漸流失，國語字從外國字轉為親法者跟抗法者都能認同的符號象徵。

20 世紀初越南知識份子受到日本明治維新的影響，發起東游運動和東京義塾運動，進行抗法的新學運動(于向東、譚志詞，2005)。「東遊運

動」跟當時的國際情勢有很大的關係。日本在 1895 年打敗中國，日俄戰爭（1904-1905 年）日本也戰勝俄國，當時中國也在康有為和梁啟超的領導下進行改革，越南的民族主義者，因此想要跟日本學習，透過西方的知識和技術，進行現代化以驅除法國殖民者，日本成為越南民族主義者朝聖的麥加（DeFrancis, 1977）。潘佩珠（Phan Boi Chau）於 1905 年 10 月，帶領 3 名越南學生到日本留學，尋求救亡圖存之道，爭取國際援助。到了 1908 年底，赴日的越南學生已達 200 人左右（陳立，2005；于向東、譚志詞，2005）。新學運動並非單純的教育改革，而是越南人追求自由、平等及現代化國家的民族解放政治運動，因此，受到法國政府的阻撓，最後在 1909 年瓦解。潘佩珠同時也跟潘周楨等人籌畫在河內建立一所自由學校，稱為「東京義塾」（陳立，2005）。

1907 年三月成立的「東京義塾」是越南羅馬字運動發展的里程碑。東京義塾主張為了國家發展吸收西方知識，將外國作品翻譯為羅馬字的越南文。東京義塾支持羅馬字是基於現代化和民主化的觀點，認為言文一致，可以打破過去只有少數精英壟斷知識界和文學界，一般大眾卻淪為文盲的社會鴻溝。因為羅馬字在現代化和普遍識字的功效受到重視，不再認為反法就必須反越南羅馬字（Lo Bianco, 2001）。「東京義塾」將越南羅馬字與民族主義結合，推廣羅馬字逐漸的成為民族主義者的共識（蔣為文，2005）。東京義塾首次大規模地推廣越南的羅馬字書寫，並擴大越南語各種領域的書寫。東京義塾以多樣的方式，演講、詩歌朗誦、演戲進行宣傳活動（DeFrancis, 1977: 164），包括對漢字的負面行銷，比如說，潘佩珠這位國語字的主要提倡者，就曾在東京義塾進行一場名為「越南要是不廢除漢字就無法得救」的演講（Marr, 1971: 169）。潘佩珠的革命思想以中文書寫，卻以流行歌的形式在越南廣為流傳。特別是他支持羅馬字運動，1907 年在 *Tan Viet Nam*（新越南）呼籲將羅馬字引入教育體系（DeFrancis, 1977）。阮文永是東京義塾的創辦人之一，負責越南羅馬字和法文的推廣與教學，他還跟友人組織「翻譯會」將重要的法文、漢文、字喃文譯成國語字，也經營印刷廠，擔任過報紙雜誌主編（蔣為文，2005）。翻譯在羅馬字越南文發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除了保留漢文、喃字的文獻之外，也將外國文

學和新知翻譯成越南文。東京義塾的教學相當新穎，注重交流、討論和時事分析。東京義塾理念得到不少認同，其他地方也仿效東京義塾，創立類似的新式學校。殖民政府恐怕東京義塾鼓動反法運動，於 1908 年初被政府強行關閉（陳立，2005）。1932 年成立的越南共產黨也支持國語字。1938 年在共產黨的協助下國語字傳播委員會發動國語字運動（于向東、譚志詞，2005）。

有了文字系統還不夠，需要進行語言本體規劃（*corpus planning*）建立讀寫的基礎建設。爲了擺脫越南語粗野不文，不適合高級文化的偏見，需要積極的發展本土語言讀寫（*vernacular writing*）、擴充語體功能及發展文學語言。越南知識份子在 19 世紀末逐漸認識到國語字的重要，開始推廣越南羅馬字。南圻開始有作家使用國語字創作文學作品（唐慶華，2009）。東京義塾更帶起學習國語字的風潮。書寫國語字變成愛國的行爲，越南羅馬字的出版品大幅增加。1925 年第一部羅馬字越南小說出版，有 75 種使用國語字的報紙（Hannas, 1997）。法國政府也透過親法者推行國語字越南文，以拉攏受教育的越南精英，不過，也間接的促進越南語文的現代化及語體和文學的發展（Le & O’Harrow, 2007）。法國政府支持越南羅馬字雜誌出版，打擊越南民族主義，結果造成支持越南語者不一定是愛國者，而推廣法語者也不一定是通敵者（Marr, 1981），語文界限變成難以區分敵我。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親法者，依然堅持越南語文的文化自主性，支持越南文的發展。蔣爲文（2011：279）特別提及新生代雙語認同的特色：

Ti 法國新式教育下 ê 新生代像「阮文永」、「范瓊」等通常主張用越南羅馬字。Chit-kóa 新生代 sui-bóng 同時精通法文 kap 越南文，mā 認為法國文明是值得越南人學習 ê 對象，in 並無 án-ne 就來看輕越南語文。In 認為法文是越南人進行現代化、文明化 ê 工具之一 niâ，終其路尾越南文化 iáu 是 ài 建立 ti 越南語文頂頭。

范瓊（*Phạm Quỳnh*）是《南風雜誌》（*Nam Phong Tạp Chí*）的主筆，也從事翻譯、研究和創作的工作（蔣爲文，2005）。范瓊的定位或許仍有爭議，不過他成功的連結越南語和文學創作傳統，引發大眾共鳴。以下的

引文可以看出范瓊的文化自主性（蔣為文，2011：278）：

總結來講，「國學」bē-sái 脫離「國文」。若無國文 mā 無法度成立國學。咱越南國過去無應該用漢字建立國學，未來 mā 無應該用法文建立國學。咱越南國 beh 建立國學就 ài 用越南話文 chiah thang(Phạm Thị Hoàn, 1992: 56)。

在第一次大戰結束前，以國語字寫成的越南語詩歌和散文大量湧現。作家及作家社群在 1920 年代慢慢成長，1930 年代激增，出現在文集、新聞報紙、雜誌，各式各樣的短篇小說、詩歌創作也興盛，都是以國語字寫成的，形成文學出版和國家教育並肩推廣國語字的局面（Le & O'Harrow, 2007）<sup>4</sup>。越南文人如阮文永創辦《印支雜誌》（1913-17），范瓊辦《南風雜誌》（1917-34），支援通俗文學的創作，提倡用國語字寫作（于向東、譚志詞，2005）。Romaine（1994）認為本土文學語言的發展有許多意義，包括：(1) 提升語言聲望；(2) 促進語言標準化和精緻化；(3) 促進語言保存；(4) 反霸權、去殖民化的有效方法（引自張學謙，2009）。各種文體的寫作對國語字的傳播和越南文的發展功不可沒。這些羅馬字著作證明越南語能表達複雜的觀念，打破越南語低劣無法書寫成文的偏見。Martin（1982: 37）認為這一系列的出版比任何長期規劃對羅馬字的接受和傳播，更加有效，DeFrancis（1977: 193）也認為「建立文字系統最為關鍵的事情，不是有無文字，而是文字實際用於出版的多寡。」。

越南面對殖民統治，在爭取語言文化自主權的過程中，在語言政策抗爭中涉及各式各樣的語言規劃活動，如文字改革、象徵和政治的抗爭、語言地位、術語擴充、編纂化、標準化和精緻化等活動（Lo Bianco, 2001）。越南語羅馬字取得國語字地位的過程可以歸納以下五個步驟（Le & O'Harrow, 2007: 428）：

1. 在 19 世紀和 20 世紀之間越南有四種不同的書面語：漢字、字喃、國語字和羅馬字書寫的法文；
2. 法國殖民政權為了方便統治，嘗試操弄越南的聲望語言（prestige

<sup>4</sup> 關於越南羅馬字文學的發展及其對臺灣的啟示，請參考蔣為文（2011）。

language)，一開始是有限度的推廣法語，接著大力提倡越南語的羅馬字化，從而將中國文化認同轉變為對法國殖民政權的忠誠；

3. 一開始漢字和字喃成為抵抗法國的象徵，使用越南羅馬字被貶為親法通敵者；後來，民族主義者體認到現代化的必要及羅馬字比其他文字更有助於現代化，羅馬字就逐漸被接受；
4. 以羅馬字進行文學創作，將漢文和字喃文學翻譯成越南羅馬字，證明瞭羅馬字能記錄複雜的概念，也能作為文學創作的工具，這些都有助於提高國語字的接受度；
5. 到了殖民後期，越南羅馬字在文字之爭中，取得勝利，因此，在越南實際獨立之前，國語及其書面語早已確定。

## 肆、從語言政策理論討論越南羅馬字政策

上一節已經討論過越南羅馬字的推廣過程，大致描述了官方和民間進行的羅馬字語言管理和語言實踐。Spolsky (2004) 的語言政策理論有三個部分：語言實踐、語言意識形態和語言管理。本節運用 Spolsky 的語言政策理論，分兩小節探討語言意識形態的變遷及所涉及的語言管理機制。

### 一、語言意識形態的變遷

鄒嘉彥 (2000: 21-22) 嘗試討論漢字文化圈演變的過程，提出兩個影響因素：功能因素 (漢字或其變體標寫自己也有的適用性) 與地位因素 (漢語地位的高低)，由此可以排列出四種可能。他認為越南語的情況是從「功能好、地位高」變成「功能好、地位低」，因而放棄漢字，改用羅馬字。這樣的分析，僅重視語言的工具性動機，忽略了整合性動機<sup>5</sup>。語言的工具性動機有其重要性，在雙言社會中，高階語言用於正式場合，有較高的社

<sup>5</sup> 語言學習動機包括工具性動機 (instrumental motivation) 和整合性動機 (integrative motivation)，前者指的是透過語言「追求社會認同或經濟利益」(Gardner & Lambert, 1972: 14)；後者強調社會和人際關係，關心目標族群的身份認同，強調語言的情感性作用 (Gardner & Lambert, 1972)。

會地位和聲望，的確比低階語言容易傳播。越南文字之戰就是羅馬字從低階文字躡升為高階文字，漢字則剛好相反。不過，何以越南人不支持在越南語言位階占最高階的法文呢？單從工具性動機無法解釋這樣的選擇。另外，法國政府削弱漢字、去漢化的作為，也不是基於工具性動機，而是為了去除越南人的中國認同，使之轉而依附法國。

屬於整合型動機的族群認同和民族主義是越南文字改革相當重要的驅策力。這一方面，Le 與 O'Harrow (2007) 提供一個較為動態、全面的分析。他們認為越南文字改革過程顯示語言象徵價值 (symbolic value) 和實用價值 (pragmatic value) 之間衝突和互動關係。國語字原本的負面象徵價值，後因為羅馬字在傳播民族主義思想的實用價值受到肯定。促使民族主義者採用羅馬字，造成羅馬字象徵價值的逐漸轉變，國語字因此從依附法國的負面價值，變成有助國族建構、現代化的象徵價值 (Le & O'Harrow, 2007)。

Le 與 O'Harrow (2007) 正確的指出，實用價值和象徵價值之間可以轉化，不過，羅馬字的實用價值是否主要來自民族主義則需要商榷，另外，羅馬字如何被賦予正面的象徵認同價值或是說整合型動機？我的看法是，羅馬字的實用價值來自法國政府對漢字和羅馬字在語言地位、功能做不平等的分配，導致前者逐漸失去聲望和功能，後者則步步高昇，時間一久，實用價值帶來的工具性依附，間接的促成羅馬字的象徵價值和整合型動機。但是羅馬字象徵價值的主要貢獻者應當來自新一代革命家所追求的現代化和國族建構的目標。新一代的抗法民族主義者跟第一代以傳統文人為首的抗法者，最大的不同大概就是對國語字的態度。DeFrancis (1977: 163) 將新舊的抗法者，做以下的比較：

早期學者與士紳組成的抗法團體厭惡羅馬字，習慣以漢字或喃字書寫；新一代的抗法領導者卻認為他們也可以使用羅馬字作為武器，進行對法國政府和親法者的語言之戰。

新一代的抗法領袖決定採用國語字進行對法的語言戰爭，這項決定相當不尋常，一般民族主義的語言規劃者，通常厭惡外來影響 (Fishman, 1972)。Fishman (2006) 提出語文本體規劃的兩個叢集 (cluster)：(1) 獨立叢集 (independence cluster)：強調純粹、獨特、古典和語言發展面向；

(2) 相互依賴叢集 (interdependence cluster)：強調語言符號的通用性，追求跨越政治、文化界限的相互分享、互通。他認為在強調民族主義的運動中，通常在語文本體規劃會強調獨立的叢集。越南革命者為何選擇偏向相互依賴的文字，不採取獨立的路線？更有意思的問題是，越南羅馬字如何從外國文字變成本國文字？如何達成文字認同的改弦更張？

把越南的文字改革放在更為廣闊的背景，越南羅馬字可以說是「制度同形化」(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在文字上的表現。汪宏倫(2004)引用 Meyer 等人(1997)的「制度同形化」的概念，指出在「世界文化」(world culture)的影響下，世界各國的制度在結構上愈來愈相似。汪宏倫(2004)進一步的提出「語言制度化」的概念，探討跨語言溝通的制度管道。Lo Bianco(2001)也指出現代化是常見的語言政策動機，文字現代化通常涉及採用羅馬字作為書面語。就此而言，越南羅馬字可說是受到文字全球化思維影響的在地行動。

羅馬字雖然方便和其他的語言溝通，容易學習與發音，不過，別忘了語言文字除了溝通的工具性價值外，還有象徵的功能，其中最為重要的應該是，作為現代化的象徵。汪宏倫(2004: 142)指出：

拉丁字母，其實成了「現代化」的象徵；不只成為象徵，還是現代化的工具，許多語言(包括中文)的現代化，都依賴拉丁字母，無論「國羅」、「北拉」或《漢語拼音方案》，都有強烈的「語文現代化」意圖，甚至認為必須要把漢字完全廢掉，否則難以現代化。

越南成功的廢除漢字，但是中國並未廢棄漢字、改換拉丁字母。Kosmarskii(2007)指出，在 19 世紀末及 20 世紀前半業亞、非洲國家新一代的精英認為採用拉丁字母是去除愚昧、落後及傳統主義，追求現代化必備的工具。1920 及 1930 年代，蘇聯就進行的大規模文字改革運動，類似的拉丁化運動也發生在中國、越南、土耳其和印度尼西亞。

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越南知識分子認為普及識字(literacy)是國家富強的關鍵(Marr, 1981: 138)。因此，越南知識分子為了追求大眾普遍識字，全力支持國語字的發展，到後來甚至取代其他書寫系統(Marcucci,

2009)。羅馬字讀寫變成自我充權 (self empowerment) 的活動，洗刷過去負面的形象。不再像漢學者一般鄙視羅馬字，將之視為外來文字，反而挪用 (appropriate) 羅馬字視為抗法、抵殖民的武器<sup>6</sup>。新一代的革命家及反殖民的新思維支持羅馬字，應當是透過新學運動的影響，瞭解世界發展趨勢及現代觀念，從而得到一個語文現代化的結論 (Lo Bianco, 2001: 187)：推廣識字、啓迪民智為建國要務，而羅馬字就是最能促進大眾識字的利器。現代化被視為民族解放的基本要件，Lo Bianco (2001: 202) 認為只有挪用國語字，才能建立現代化作為社會轉型的意識形態的論述基礎。在這方面漢字、法語和喃字都無法成立，漢字和法語都是外來的語言，屬於精英階層的語文，缺乏群眾基礎；喃字和民族解放可以連接，卻不容易和現代化掛鉤，加上複雜、沒有效率，推廣不易，不適合作為大眾教育的語言。

汪宏倫 (2004) 將文字分為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前者是為了語言學習或溝通方便，後者嘗試透過「語文現代化」追求國家富強的民族主義。據此，我認為國語字的象徵價值主要來自為了追求現代化、獨立自主的價值理性。在民族主義的旗幟下，越南羅馬字改頭換面以現代化的姿態再現，語言政策就是在語文的使用、態度和學習方面，做有意識的變遷。越南羅馬字的變遷顯示，文字的象徵意義是建構出來的，文字本身並沒有什麼不可變的本質，語言的象徵價值可以轉換，從「負面」變成「正面」，從「他們的」變成「我們的」，從「殖民」到「抵殖民」的象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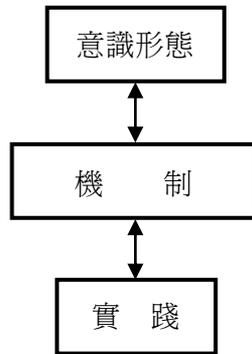
## 二、從語言管理機制到實際的語言政策

Spolsky 的語言政策理論由語言實踐、語言意識形態和語言管理組成。Shohamy (2006: 52) 將之定義如下：(1) 語言實踐：集中於實際發生的語言實踐；(2) 語言信念 (語言意識形態)：語言政策背後的語言意識形態；(3) 語言管理 (語言規劃)：操弄或管理語言的行為。本節討論國語字語言意識如何透過「機制」 (mechanism) 成為實際的語言政策 (de facto language

<sup>6</sup> 中國並未以羅馬字取代漢字，不過卻也是用漢語拼音作為漢字的注音工具。這也是一個強調語文現代化，而挪用羅馬字的例子，汪宏倫 (2004: 161) 提到中國同樣透過對西方文字的挪用達到自我充權的目標。

policy) 或是說語言實踐。

Shohamy (2006: 54) 以「機制」這個術語取代語言管理，如圖 3 所示，機制介於語言意識形態和語言實踐之間，它能「作為影響、創造和促進實際語言政策的手段」。機制的概念，可以協助我們刻畫從語言意識形態轉為實際的語言政策中間所涉及的或明或暗的政策手段 (policy device)，同時也跳脫一般只重視政府作為的限制，而包括由下而上嘗試影響實際政策或是將意識形態化為實踐所採用的方法 (Shohamy, 2006)<sup>7</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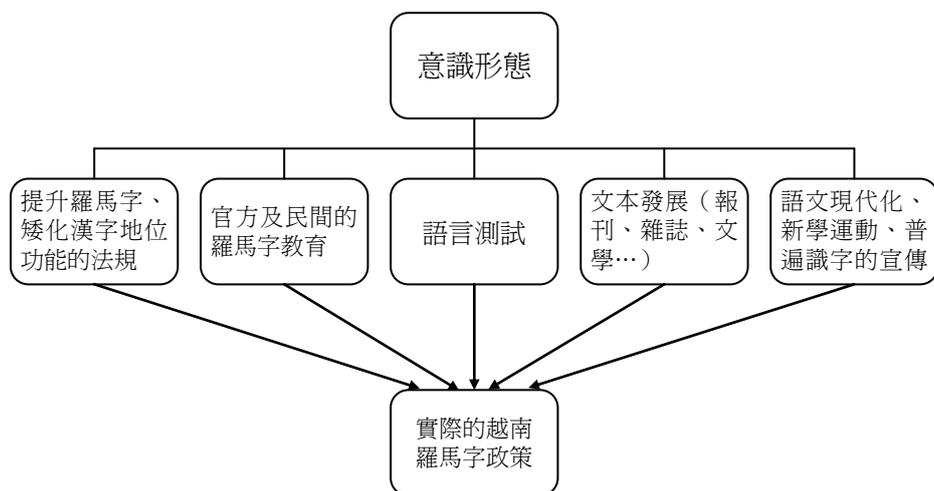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Shohamy (2006: 54)。

圖 3：意識形態 - 機制 - 實踐關係圖示

語言意識形態可以透過機制影響語言實踐，反過來，語言實踐也可以透過機制影響語言意識形態。機制也可以作為行銷的工具，Shohamy (2006: 57) 就說：「事實上，所有的機制都是行銷語言意識形態的形式」。本節將借用 Shohamy (2006) 擴充的語言政策概念，的概念，整理出越南羅馬字政策所採用的「機制」，同時討論「語言行銷」(language marketing) 的重要性。

我們已經討論過越南羅馬字推廣涉及的多方面作為。圖 4 將相關作為整理成示意圖。圖 4 中間的部份就是越南羅馬字推廣的機制。

<sup>7</sup> 為了和 Spolsky (2004) 的理論配合，我們將「語言管理」與「機制」合併成為「語言管理機制」，在行文中有時簡稱為「機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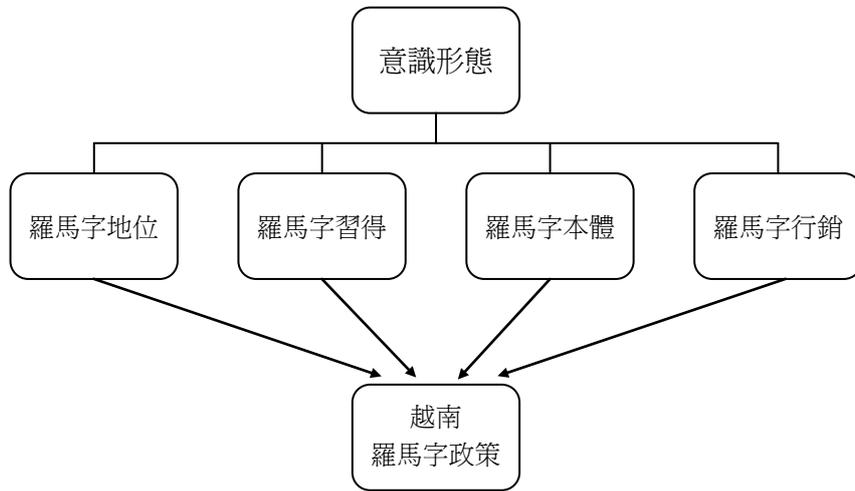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參考 Shohamy (2006: 58)。

圖 4：越南羅馬字政策示意圖

我們可以進一步根據 Cooper (1989) 的語言政策概念分為：(1) 語言地位 (status) 機制：提升羅馬字、矮化漢字地位功能的法規，將羅馬字定為語言測試科目；(2) 語言本體 (corpus) 機制：語文本體的發展、擴充文體等語文建設；(3) 語言習得 (acquisition) 機制：法國殖民政府及越南民族主義者都有羅馬字的學習規畫，透過學校教導羅馬字。至此，Cooper (1989) 的三種語言政策概念都已經用上了，不過，示意圖的最右項卻無法納入他的架構。因此，本文增加(4) 語言行銷 (language marketing) 機制，補充其不足。這個項目主要是推廣語言形象 (image) 的相關作為，如強調現代化、普及識字等的宣傳活動。

如圖 5 所示，越南羅馬字政策是透過四種機制推動的，包括：地位、本體、習得和行銷機制。這樣的分析可以補充先前研究缺乏語言政策理論支撐的不足，同時也將越南羅馬字政策諸多作為，化繁為簡的歸納出主要的面向。



資料來源：參考 Shohamy (2006: 58)。

圖 5：越南羅馬字政策示意圖

以下簡單的討論越南羅馬字為何需要語言行銷，及其他機制為何也能算是行銷語言意識形態的理由。語言行銷就是把語言視為產品，透過行銷策略進行語言推廣 (Wynee Jones, 1996; 張學謙, 2010)。Wynee Jones (1996: 75-76) 進一步把語言產品細分為一系列的次產品，包括：(1) 語言能力；(2) 語言態度；(3) 語言使用；(4) 語言價值觀。這當中語言態度和語言價值觀直接訴諸語言意識形態或語言信念，至於語言能力和語言使用則是透過相關的獎賞系統 (reward system) 加以鼓勵，提升其正面形象。

不管直接或是間接的行銷，目的都在進行意識形態的澄清，建立正面的形象。考慮越南過去因為獨尊漢字、漢文造成對羅馬字的鄙視，羅馬字推廣需要處理這些輕蔑羅馬字的意識形態，才能激發學習和使用羅馬字的行動。有趣的是，越南羅馬字的推行，不但正面的建立羅馬字的工具性和情感性價值，它還一方面以負面行銷的方式打擊漢字，比如說，潘佩珠就曾在東京義塾進行一場名為「越南要是不廢除漢字就無法得救」的演講 (Marr, 1971: 169)。另外，范宏貴、劉志強 (2008: 271) 也提到漢字在越南近代成為國家落後的「代罪羔羊」，羅馬字的興起，和「使用漢字就是國家民族落後之原因」密切相關。

語言測試在這場文字之戰中扮演關鍵的角色，科舉制度是傳統文人主要的獎賞系統，當法國政府廢除科舉制度的時候，漢字、漢文就失去工具性價值；而羅馬字被規定為升學、就公職的條件時，也就賦予羅馬字工具性價值，提升學習羅馬字的動機。由此可知，行銷機制跟地位、本體及習得機制都有連帶關係，彼此有相互依賴、互助的關係。

## 伍、結論

19 世紀中期，越南除了兩種漢字（喃字和漢字）外，又有傳教引入的羅馬字形成特殊的三文現象，漢字為高階文字，喃字和羅馬字則為功能有限的低階文字。法國殖民政權介入後，原本穩定的高低雙文現象重新調整，羅馬字成為官方去除漢文化影響的棋子，新一代的越南革命家順勢挪用羅馬字，將羅馬字與越南語言現代化和國族建構連結在一起，結果羅馬字在這場文字之戰中取得勝利，成為國家語言文字認同的象徵。

越南是漢字文化圈中唯一以羅馬字取代漢字的國家，其羅馬字政策特別引起文字改革研究者及實踐者的注意。相關的研究主要描述從漢字轉換為羅馬字的歷史過程，可惜的是，先前的分析缺乏語言政策的概念。羅馬字政策是文字改革的議題，按理說，應該從語言政策的角度分析文字改革的過程和相關因素。為了補充這方面分析的不足，本文運用相關的語言政策概念，如 Cooper (1989)、Spolsky (2004) 及 Shohamy (2006)，歸納出越南羅馬字政策背後的語言意識形態及化為實際政策時採用的語言管理機制，本文的結論可以歸納為以下五點：

1. 影響文字接受與否的因素有多樣：文字不僅是溝通工具，還是身份認同的象徵；因此，工具性動機或是說實用價值及情感性動機或象徵價值，都會影響到文字的選擇；
2. 從外國字到本國字涉及語言意識形態的改弦更張，羅馬字在象徵層面上從負面的社會評價，轉向正面，主要是透過將羅馬字和脫漢的民族主義及語言現代化的信念掛鉤取得正當性；另外，羅馬字在官方的推動下取得實用的工具性價值，建立了社會獎賞系統，隨著地

位、功能的提升，也促進了情感性的依附；

3. 語言意識形態透過機制的中介，轉為實際的語言政策，我們將相關的語言規劃作為歸納為四種機制，包括：地位、本體、習得和行銷機制。這顯示文字改革並非僅僅是語文本體的規劃，還需要其他機制的協力合作，才有可能成功。由於行銷對於語言信念、語言態度轉換的重要性，本文將語言行銷也納入語言管理機制；
4. 語言意識形態、語言管理機制和語言實踐有著互動的關係。因此，可以藉由操控語言管理機制及語言實踐，改變文字的意識形態，比如說，廢除科舉制度，就影響到漢字的延續力和工具性價值，對文字的正面或負面行銷，也會影響文字的社會評價跟接受度；
5. 僅考慮越南國內的政治因素，無法妥善的解釋何以越南的文字改革選擇與法文相互依賴的文字選項，而非強調獨立性的民族形式喃字或是具有傳統的漢字。文字改革必須放在更為寬廣的脈絡下，進行考察，除了國內因素之外，也需要將國際因素納入考慮，本文借用「語言制度化」的概念說明世界文化趨勢對在地語言規劃的影響。

越南的文字改革將原本低階的羅馬字，提升為高階文字，從漢字到羅馬字的變遷，顯示屬於語言本體規劃的文字改革需要語言地位規劃的配合。文字改革猶如語言戰爭，牽涉複雜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勢力的較量，並非只是單純的語言學問題。越南的案例顯示，文字改革與民族主義和語文現代化有著密切的關係，未能將意識形態透過管理機制加以實踐，只是空言，語文自主權需要透過努力打拼才能獲得。越南長期的反殖民語言抗爭，追求語文自主權，累積了相當豐富的語言政策規劃和執行經驗，值得台灣語文運動參考。

## 參考書目

- 于向東，譚志詞，2005。《越南：革命進程中日漸崛起》。香港：城市大學。
- 汪宏倫，2004。〈將漢字羅馬化：一個「跨語際實踐」的文化政治學分析〉《台灣社會學》7期，頁123-76。
- 范宏貴，劉志強，2008。《越南語言文化探究》。中國北京：民族出版社。
- 唐慶華，2009。〈越南語言政策語言文字〉《東南亞縱橫》12期，頁33-36。
- 張學謙，2001。〈漢字文化圈的混合文字現象〉收於盧國屏（編）《文化密碼：語言解碼：第九屆社會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385-414。台北：學生書局。
- 張學謙，2003。〈母語讀寫與母語重建〉《東師語文學刊》13期，頁97-120。
- 張學謙，2008。〈雙文字的語文計劃：走向21世紀的台語文〉收於張郁慧、連金發、蘇以文（編）《一步一腳印：鄭良偉教授榮退論文集》頁203-26。台北：文鶴出版社。
- 張學謙，2009。〈國小教師 kah 大學生對台語讀寫的態度的研究〉《台語研究》1卷1期，頁24-41。
- 張學謙，2010。〈弱勢語言的復振規劃：語言行銷的方法〉《台灣原住民研究季刊》3卷3期，頁43-73。
- 陳立，2005。〈論法國殖民統治下的越南教育〉《世界歷史》5期，頁67-76。
- 黃宣範，1993。《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台灣語言社會學的研究》。台北：文鶴。
- 鄒嘉彥，2000。〈漢字的傳播與承接初論〉收於趙麗明、黃國營（編）《漢字的應用與傳播》頁17-26。中國北京：華語教學出版社。
- 蔣為文，2005。《語言、認同與去殖民》。台南：國立成功大學。
- 蔣為文，2011。《民族、母語 kap 音素文字》。台南：國立成功大學。
- 鄭良偉、張學謙，2001。〈針對英文學習需要和台灣母語特性評四套華語拼音通用性〉收於李壬癸（編）《漢語拼音討論集》頁59-78。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所籌備處。
- 羅文青，2007。〈越南語言文字使用的歷史回溯〉《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29卷1期，頁107-11。
- Cooper, Robert L. 1989. *Language Planning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ordier, Georges. 1935. "Les trois écritures utilisées en Annam: chu-nho, chu-nom et quoc-ngu" (conférence faite à l'Ecole Coloniale, à Paris, le 28 mars 1925),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nseignement Mutuel du Tonkin*, 15: 121.

- Coulmas, Florian. 1989. "Function and Status of Written Language in East Asia", in Ulrich Ammon, ed. *Status and Function of Languages and Language Varieties*, pp. 216-42. Berlin: W. de Gruyter.
- DeFrancis, John. 1977. *Colonialism and Language Policy in Viet Nam*. The Hague: Morton Publishers.
- Fishman, Joshua. 2006. *Do Not Leave Your Language Alone: The Hidden Status Agendas within Corpus Planning in Language Policy*.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Fishman, Joshua A. (黃希敏譯), 1991。《語言社會學》。台北：巨流。
- Gardner, Robert C. & Lambert, Wallace E. 1972. *Attitudes and Motivation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Rowley, Mass.: Newbury House.
- Hannas, William C. 1997. *Asia's Orthographic Dilemm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Kosmarskii, Artyom Anatolyevich. 2007. "How Is It Possible to Speak of Latinization?" *Anthropology and Archeology of Eurasia*, Vol. 46, No.1, pp. 68-74.
- Le, Minh-hang, and O'Harrow, Steve. 2007. "Vietnam," in Andrew Simpson, ed. *Language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Asia*, pp. 415-4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o Bianco, Joseph. 2001. "Vietnam: Quoc Ngu, Colonialism and Language Policy," in Nanette Gottlieb and Chen Ping, eds. *Language Policy in East Asia*, pp. 159-207. London: Curzon Press.
- Marcucci, Matthew A. 2009. "Rendering Sinograms Obsolete: Vietnamese Script Reform and the Future of Chinese Characters." *Sino-Platonic Papers*, No. 189, pp. 81-101.
- Marr, David G. 1971. *Vietnamese Tradition on Trial: 1885-192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arr, David G. 1981. *Vietnamese Tradition on Trial: 1920-194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artin, Helmut. 1982. *Chinesische Sprachplanung*. Bochum: Studienverlag Brockmeyer.
- Nguyen Quang Hong. 1999. "Chu Han va chu Nom voi van hien co dien Viet Nam." *Ngon Ngu & Doi Song*, Vol. 6, No. 5, pp. 2-7.
- Nguyen Tai Can. 1999. "Twelfth-Century History of the Vietnamese Language: Essay on the Delimitation of Periods." *Vietnamese Studies*, No. 3 (轉引自 Vasavakul, 2003).

- Phạm, Thị Hoàn. 1992. *Phạm–Quyên 1892-1992: Tuyển Tập và Di Cảo*. Paris: An Tiêm.
- Romaine, Suzanne. 1994. “Hawai’i Creole English as a Literary Language,” *Language in Society*. Vol. 23, No.4, pp. 527-54.
- Shohamy, Elana. 2006. *Language Policy: Hidden Agendas and New Approaches*. Abingdon: Routledge.
- Spolsky, Bernard. 2004. *Language poli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iun, Hak-khiam. 1998. “Writing in Two Scripts: A Case Study of Digraphia in Taiwanese.” *Written Language and Literacy*, Vol. 1, No. 2, pp. 223-31.
- Vasavakul, Thaveeporn. 2003. “Language Policy and Ethnic Relations in Vietnam,” in Michael E. Brown, and Sumit Ganguly, ed. *Fighting Words: Language Policy and Ethnic Relations in Asia*, pp. 211-38.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Viện Văn Học. 1961. *Vấn Đề Cải Tiến Chữ Quốc Ngữ*. Hà Nội: NXB Văn Hoá (轉引自蔣為文，2005).
- Wynee Jones, Allan. 1996. “Marketing: a valuable discipline in language planning,” in M. Nic Craith, ed. *Watching One’s Tongue: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 pp. 67-80. 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 From Foreign Writing System to National Writing System: Nationalism, Odernization and Vietnam's Romanization Policy

Tiun Hak-khiam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Taitung, TAIWAN*

## Abstract

Vietnam has been a digraphic society, using Chinese characters, Chữ Nôm and Quốc ngữ (Vietnamese Romanization). During French colonization, a radical script reform successfully replaced Chinese characters with Quốc ngữ. The present paper explores the “war on words”, trying to explain why Quốc ngữ can change from limited function and negative image to a symbol representing national identity. Script reform involves complex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actors. This paper uses language policy theory to explore the various factor involved in the replace of Chinese character with Roman Script. The paper highlights the role of language ideology and language management in changing Vietnam's corpus planning.

**Keywords:** Chinese character, Chữ Nôm, language policy, Quốc ngữ, Roman script, script reform, Vietnamese